

## 核心话题

## 不再“进步”的美国

在2020年美国大选拜登胜选之后,舆论曾一度认为,民主党政府会加大在政治方面的操弄,但从经济利益考虑,至少在关税上会进行大幅纠正。然而,拜登执政后,虽然通过高层对话和释放孟晚舟等行动表现出改善中美关系一定的积极态度,但对于特朗普政府在针对中国企业的关税、实体清单等方面政策却没有根本改变,延续了遏制打压中国的政策。

特朗普执政的4年,中美关系发生了大逆转,这一逆转是在美国单方面主导下发生的。那么这种大逆转到底是因为什么发生的呢?原因得从美国国内局势变化说起。

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让美国 and 全世界精英大跌眼镜。甚至让那些即使一直笃定支持特朗普的人也难以置信。

从来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特朗普为什么会取胜?有人说是因为美国社会衰落,人们盼望威权;有人说是希拉里的政客嘴脸让人讨厌所以人们才把票投给了特朗普;还有人认为社交媒体在大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特朗普能入主白宫,真正的原因是他洞悉到了美国社会情绪的变化,也就是普通白人的心理失落,所以他的政治纲领极力的迎合美国中下层白人选民且引导他们的思维方式。

对于美国社会真正的深层次问题,特朗普是心知肚明的,但显然解决这些难题必然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变革的难度也非常大。所以他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进行这种变革。但洞悉人性的特朗普的竞选谋略就是替

文/刘戈



作者为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那些部分严重不满美国现实的美国人从外部找到替罪羊。从他的竞选开始,首先声称要让墨西哥出钱修建两国边境墙,紧接着就挑起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特朗普算是那种有着卓越领导力的人,但带领人民走错了方向。对于那些真正关乎美国进步的深层次问题视而不见,靠政治操弄、撕裂社会、寻找假想敌和替罪羊来建立选民对自己的支持。

拜登上台后,虽然推翻了特朗普的很多政策,但显然同样没有能力和办法解决美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树立一个强大的外部对手,比变革沉疴已久的社会问题要容易得多。

现在的美国,野心家们靠以激化外部矛盾来获得选票,却没有力量和意愿去解决美国自己内部的社会矛盾。所谓进步性再无从体现。

美国国内政治的“进步性”相对集中的体现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这一时期的美国总统分别是西奥多·罗斯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这20年,其实对现代美国的形成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个时期之后,美国才真正从一个经济大国,演变成整个西方世界制度、理念的引领者。

20世纪最初的20年,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这段时间美国经历了一个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也就是所谓的“进步主义时期”。

三位总统在任的这20年,顺应了知识分子和新崛起的中产阶层的意愿,通过立法限制了大企业无限膨胀;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和法规规范企业的生产过程保护消费者权益;改革税收体系,让个人所得税成为税收主要来源,降低关税,在调节贫富差距的同时激活了贸易,让竞争推动经济发展。可以说,在那个时代,这些社会进步不但让美国成为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体,同时也因为这些制度变革,让美国在发展理念上从世界潮流的追随者变成了领导者。

说到进步主义时期,必须从“镀金时代”讲起。镀金时代这个词,来自于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一本长篇小说,小说出版于1873年,讲述的就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故事。大家都知道1861—1865年爆发的南北战争在美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但其更重要的是经济意义。其一,大量的黑人从南方的棉花田里解放出来,他们携家带口纷纷北上,成为那个时代美国的“农民工”,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其二,南北方成为一个整体的超大市场,在此之前,不光是南北方之间,甚至北方的各个州、南方的各个州都是各自为政,州和州之间的法律差异性很大,市场不统一。实际上,美国宪法定义的美国其实是一个国家联合体而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南

北战争后,虽然州依然有较高的独立性,但从经济和市场角度基本实现了一体化。

有了南北战争后形成的新格局,之后几十年间,美国工业迅速发展,到了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来到也就是电气化时代的到来更是让美国经济发展插上了翅膀。然而伴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带来的问题也非常严重,包括垄断性大企业巧取豪夺挤压小企业的生存空间,金融资本迅速膨胀控制经济和政治运行,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频发,工人权益得不到保障,食品安全问题日渐突出,空气、水和噪音污染,底层人民焦虑感社会浮躁心态不断增加等问题。

在马克·吐温的笔下,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贪婪成性、尔虞我诈、腐败堕落的美国社会。所以,后来人们把南北战争后到20世纪初这一段时间称为“镀金时代”。

在镀金时代的后期,也就是1890年前后,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带来的负面影响,一股发端于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的进步思潮在美国社会出现。这一年,美国社会开始警觉无限膨胀和无序扩张的资本力量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国会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虽然这部法律在出台的最初几年并没有判例,但为今后的反垄断埋下了伏笔。

189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占比从1864年的20%,增长到35%,到了1920年,住在城市里的人增至总人口的51%。(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9年到2015年差不多也是这个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中产阶层不断壮大。19世纪90年代早期,中产阶层美国人开始指望政府出面干涉美国经济、社会中的各种不堪,他们不满腐败的政客以微不足道的恩惠迎合下层选民,同时依靠贿赂养肥自己。他们目睹垄断组织操纵政府、议会、法院镇压经济和政治运行,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频发,工人权益得不到保障,食品安全问题日渐突出,空气、水和噪音污染,底层人民焦虑感社会浮躁心态不断增加等问题。

这些不满、忧虑以及由此产生对变革的渴望被称为进步主义运动。进步主义运动早期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到了20世纪初蔓延到州和联邦的层面。进步运动是对大公司无限膨胀的一种反击,成为19世纪90年代到一战结束之间美国最重要的社会运动。

进步运动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反垄断,包括从罗斯福执政时对北方证券公司掌控的两家铁路公司合并的否决,北方证券背后的大佬是当时被称作可以重组世界的摩根。还有对石油巨头洛克菲勒拥有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肢解,在经历6年旷日持久的诉讼后,到罗斯福的继任者塔夫脱掌权的时候,标准石油被肢解成30多家公司。第二个方面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一本名叫《屠场》的小说,唤起了工业化社会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也促使政府出台了针对食品安全的一系列规则和标准。第三个方面是在受基督教传统影响的美国人那里,税收是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但在伍德罗·威尔逊任上,这一

传统上被看作大逆不道的税收方式被美国社会理解,在进步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公共利益的概念开始被一贯追求自由的美国人所接受。

我们回顾和剖析这段历史,对于理解现代美国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美国现在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也会有所帮助。100年前,进步运动时期,美国社会不断寻求变革,在斗争与冲突中寻找改革的机会,各种新旧力量和社会阶层既有激烈的竞争又有相互妥协。在思想上包容并蓄,传统的基督教精神、原教旨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在这里交汇,虽然斗争激烈,但通过社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实现了一些重大的社会变革,一些原来被当作天经地义的规则被改变,一些被传统主流社会完全看作妖魔鬼怪的思想逐渐被接受。

在此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肯尼迪时代、里根时代,都曾经有过社会层面大刀阔斧的变革。这些变革的核心是打破利益集团固化的利益,使社会重新焕发活力。

而反观现在的美国,作为曾经的“灯塔”,虽然依然是世界第一大国,依然在科技、军事、教育、娱乐等领域遥遥领先于世界,但在制度和理念的引领方面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生机勃勃的美国。美国和历史很多强国曾经经历的历史相似,强国在发展的鼎盛阶段之后,如果政治上不能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实现破茧重生,就会通过树立外部敌人来对冲国内的矛盾。

## 养老中国

## 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企业需要关注哪些关键词?

前不久,在全社会日益关注人口老龄化之际,《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作为指导新时代老龄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意见》共分8个部分、24条,主要部署了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积极培育银发经济等方面的老龄工作任务,充分体现了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念、方针、原则和思路。

对于《意见》的发布,企业具体需要关注哪些关键词呢?

第一个关键词是“全局”。《意见》开篇指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前的“两个事关”相比,“三个事关”是对老龄工作地位和作用的最新判断。同时,《意见》还首次提出将老龄事业发展纳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老龄工作提升到了新

文/李佳



作者为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的战略高度。

第二和第三个关键词是“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纵观《意见》全文,无论是社会环境的构建、政策法规的制定、相关资源的调配供给、市场的培育引导和监督管理,还是建立基本服务清单、明确服务标准,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这两个词可谓是贯穿始终,反复强调。《意见》还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坚持党政主要负责亲自抓、负总责,将老龄工作重点任务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民生实事项目,纳入工作督查和绩效考核范围。

第四和第五个关键词是“市

场机制”和“多元化服务”。就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定位,《意见》明确提出,在党委领导下,充分发挥政府在推进老龄事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社会参与,全民行动,提供基本公益性产品和服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供多元化产品和服务。这为老龄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就市场机制的地位,《意见》进一步提出,推动老龄事业与产业、基本公共服务与多样化服务协调发展。《意见》还专门设立了银发经济部分,提出规范发展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食品、药品以及老年用品行业,大力发展养老相关产业融合的新模式新业态等。

第六个关键词是“各方参与”。《意见》提出,形成多元主体责任共担、老龄化风险梯次应对、老龄事业人人参与的新局面,并对政府、社会、市场、个人、家庭的作用,卫生健康、发展改革、民政等部门的分工,各级组织的职责,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定位,都做了进一步的明确,以推动多元力量的合作

联动,政策制度的衔接配套,部门之间的功能协调。

第七个关键词是“社区养老”。《意见》提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通过新建、改造、租赁等方式,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着力发展街道(乡镇)、城乡社区两级养老服务网络,依托社区发展以居家为基础的多样化养老服务。地方政府负责探索并推动建立专业机构服务向社区、家庭延伸的模式。街道社区负责引进助餐、助洁等方面为老服务的专业机构,社区组织引进相关护理专业机构开展居家老年人照护工作;政府加强组织和监督工作。

为什么《意见》如此重视社区养老?一方面,养老机构已经得到迅速发展。据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2.9万个,比2015年年底增加了21.3万个,规模扩大了2.83倍;养老床位合计821.0万张,比2015年年底增加了148.3万张。另一方面,社区养老作为居家养老的重要支撑和连接机构养老的关键节点,作用特殊,地位重

要。此外,《意见》还提出,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作用,探索“社区+物业+养老服务”模式,增加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有效供给。

第八个关键词是“老年教育”。《意见》提出,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教育部门牵头研究制定老年教育发展政策举措,采取促进有条件的学校开展老年教育、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老年大学(学校)等办法,推动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鼓励有条件的高校、职业院校开设老年教育相关专业和课程,加强学科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编写老年教育相关教材。依托国家开放大学筹建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资源共享和公共服务平台。创新机制,推动部门、行业企业、高校举办的老年大学面向社会开放办学。总的来说,老年教育可谓是一片蓝海。对于一些被列为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机构来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转型机遇。

第九个关键词是“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意见》提出,2022年年底,建立老年人能力综合

评估制度,评估结果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跨部门互认。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0%。另有数据表明,我国失能老人已达4200万人,老年病患达到1.8亿人。我国老年人能力评估目前仍是人工手段,难以满足如此庞大规模人群的需求,急需研发更加便捷、更加智能的新办法。这为从事图像识别、步态识别、语音识别的人工智能企业提供了非常好的应用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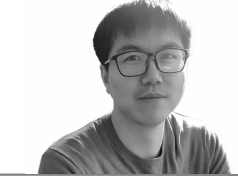
第十个关键词是“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意见》提出,大力发展企业(职业)年金,促进和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探索通过资产收益扶持制度等增加农村老年人收入。传统意义上,第三支柱指的是个人为养老所做的准备,包括购买房产证券、银行存款、购买基金保险等各种内容。而《意见》中凸显出对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关注,为保险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利好。《意见》中还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在风险可控和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开发老年人健康保险产品。

## 自由谈

## “就地过年不能加码”别停留在号召上

又是一年春节将至,这是疫情之下的第三个春节。对很多人来说,因为之前两年的遗憾,今年肯定希望春节“团团圆圆”,但又考虑到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现实,总让人犹豫不决。眼下,陕西、河南、天津等地的疫情,更让人心有余悸,这不仅让多地的疫情防控形势变得很严峻,也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置于这样的现实语境下,春节能不能回家?是否需要继续就地过节?便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文/龙敏飞



作者为媒体评论员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就地过节减少人员的流动,是降低病毒传播的重要做法,也早已是社会共识。在疫情防控充满未知的

现实语境里,倡导就地过节,的确是及时有效的一种呼吁,用一时的留守换来长久的安宁,对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好事。当然,倡导并不是强制,呼吁也不是必须,对一些思乡心切又有条件回去的人来说,是否也需要“一刀切”地就地过节呢?这备受关注。专业的事情应该让专业的人来回答,这是常识,在此事上,亦如此。

在春运即将来临之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曾

表示:春节期间是不是“就地过年”要基于风险研判,全国不能“一刀切”,各地应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因地制宜地出台相关政策。1月6日,钟南山院士在广州的一个分享会上表示,“没有封控的地区,即低风险地区,市民可以在做好防控的前提下,有条件地回家过年,不需要完全停摆。”这足以证明,权威观点都是:可以回,但要做好防控。这样的观点,不仅契合民意,也契合常识。

过去这两三年,在疫情防

控上,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形成了一整套的经验与做法,这些都是防疫抗疫的“财富”。如何实行精细化的措施防疫抗疫?如何确保安全?等等,这些事情,各地都可以有建立在经验主义之上的具体操作。缘于此,央视发文称,就地过年层层压实但不能层层加码,便是积极有效的呼吁、号召。就眼下来说,一些网络上的信息还是指向一点,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基层,已经开始“人为加码”了,如在

隔离、核酸检测上加码,给人一种“最好别回来”的感觉。这样的做法,很多被曝光之后虽然也被纠正了,但终究是一种事后的纠偏,并非最优选择。

倡导就地过节,这是有关部门的号召与倡议;不能层层加码,那也是基本的认知与共识。从这来说,倡导就地过年不能加码就不能停留在号召上,而应该成为各地的坚定信仰,你可以用激励的方式留下“打工人”,但你不能人为设置障碍不让有条件可以回家的“打工人”回家。